

《左棻墓志》及其价值

徐 传 武

李长之在《西晋大诗人左思及其妹左芬》一文中说：“至于左芬的下落，我们更不清楚。可能她是在贾后残害杨皇太后时就已经死了，因为她是接近杨后的……况且贾后又是忌刻狠毒的妇人，很可能左芬也死于此难了。这时是公元292年，距她入宫已二十年，如果我们的推测合理，她大约死在四十岁左右。”^①李先生的这个推测究竟怎样呢？可以说是不太合理、不太准确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三十年代初新发现的《左棻墓志》不利于李先生的推测。李先生此文发表于四十年代末期，当时《左棻墓志》已发现了十几年，李先生的观点与《墓志》所载相距甚远，可能是李先生未注意到《墓志》这一重要发现。

这块《左棻墓志》是1930年在河南省偃师县城以西十五里之蔡庄村一位姓鲍人家地中出土的，曾先后被新安张氏、三原于右任等收藏。这块墓志高27.3厘米，宽14.3厘米，厚3.9厘米，正面有字四行，每行十字，共三十九字，内容是：“左棻字兰芝，齐国临淄人，晋武帝贵人也。永康元年三月十八日薨，四月廿五日葬峻阳陵西徼道内。”背面有字七行，每行十二字，共五十字，内容是“父熹字彦雍，大（太）原相弋阳大（太）守。兄思字泰冲。兄子髦字英髦。兄女芳字惠芳。兄女媛字纨素。兄子聪奇字骠卿，奉贵人祭祠。嫂翟氏。”（每句号前为一行）正面、背面文字均为隶书。^②墓志中明确地记载了左棻逝世于永康元

年，即公元300年，比李长之先生推测的292年晚了八年之久，左棻享年也不是“四十岁左右”，而是接近五十岁了。此乃根据她泰始八年（公元272年）“拜修仪”等推测，详情容另文论述。同时可知，李长之先生推论左棻是“接近杨后”的，因而被与杨后有隙的贾后害死的看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另外，史书等皆记载左思这位妹子名“左芬”，李长之论文因之，但据《墓志》，应为“左棻”。可能史传等皆因采别传之类的书写成“左芬”沿袭而来，自当以《墓志》所载为确。

这块墓志对于左思和左棻的研究，对于当时某些历史文化现象的研究，都有着其他文籍记载难以替代的价值和作用。以上谈到的左棻的卒年，如果没有这块墓志，人们可能会做种种推测，但毕竟难以定论，因而对左棻后期的研究也就难以深入，难以准确，而此墓志的发现就把左棻生活的时代基本确定下来。据《晋书·惠帝纪》载，永康元年三月癸未（二十二日）“贾后矫诏害庶人遹（故皇太子司马遹）于许昌”，夏四月癸巳（初三日），“梁王彤、赵王伦矫诏废贾后为庶人，司空张华、尚书仆射裴頠皆遇害，侍中贾谧及党与数十人皆伏诛”。甲午（四月初四日）“伦矫诏大赦，自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己亥（四月初九日），“赵王伦矫诏害贾庶人（即贾后）于金墉城”。左棻死于是年三月十八，当时变乱尚未作，其死当与变乱无关，应当是因病而死。但左棻死后数日，而变乱则生。其墓志高、宽与一砖相差无几，在古代墓志石中，极罕有如此之小者^③，似可想见当时的葬礼是极为简陋的，可能与当时正处于大乱之中有关。峻阳陵，即晋武帝司马炎陵墓，在洛阳城北。徼道，即巡行警戒之道路。左棻葬于此处，虽曰“附葬”，但地位并不显赫，不像汉武帝李夫人墓那样。何况“国君之母，非适不得配食。妃嫔之薨者不列于庙而有祠，如怀帝策武悼皇后改葬峻阳陵侧别祠弘训宫是也”。^④左棻未有子息，故以兄次子左聪奇奉祭祠。晋代的这种

“以侄祠姑”之礼，后世已不多见。古之墓志，多载祖考子女之名，左棻无出，故墓志上记载了兄嫂侄儿侄女之姓名。从这里似乎可以看出左棻与司马氏皇族远不如娘家人亲近。这块墓志或许是她娘家人制做的，那时皇亲国戚正处于白热化的权力争夺之中，已无暇为左棻殡葬，故由娘家人草率安葬了事，因而墓志中多载了娘家人的姓名。不论是否真的出于此因，但此墓志这样记载的结果，却为我们研究左氏兄妹提供了极为珍贵而难得的资料。

《左棻墓志》记载：“左棻字兰芝”。史传无关于左棻之字的记述，可补史传记载之阙。其兄左思有《悼离赠妹诗》，曰：“娥娥令妹，应期挺生。如兰之秀，如芝之荣”，左思所以这样写，当因切左棻字“兰芝”而来。如果不知左棻之字，固然也能明白诗句的表面喻意，但却无法了解其“嵌字”所含蕴的深层寓意。《墓志》又谓左棻乃“晋武帝贵人也”，《晋书·左贵嫔传》称左棻于“泰始八年，拜修仪……后为贵嫔，姿陋无宠，以才德见礼”。史传无关于左棻曾为“贵人”之说。罗振玉先生论说《墓志》此载时说，“贵嫔、贵人初不知是一是二，及秩之高下”，读了《晋书·孝武文李太后传》“太元三年进为贵人，九年又进为夫人”，认为“是夫人之次为贵人。贵人疑在三夫人之列，贵嫔或在九嫔中，殆是二非一”。^⑤把“贵嫔”归于“九嫔”之列是错误的。《宋书·后妃传序》曰：“晋武帝采汉、魏之制，置贵嫔、夫人、贵人，是为三夫人，位视三公。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是为九嫔，位视九卿。其餘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视千石以下。”可见，“贵嫔”与“贵人”同在“三夫人”之列，“贵嫔”比“夫人”、“贵人”秩位还要稍高，观《晋书》于《后妃传》先列“左贵嫔”、“胡贵嫔”（且详述）而后方列“诸葛夫人”（且略述）可知此言之不诬。容庚先生论此《墓志》据《初学记》卷

十引臧荣绪《晋书》云“武帝采汉魏之号，以拟周之六宫，置贵妃、贵人、夫人，是为三夫人”云云，把顶关键的“贵嫔”错引成了“贵妃”，又曰：“《御览》卷一百四十五及卷一百四十四引王隐《晋书》云‘拜芳（胡贵嫔）为贵嫔，后拜芳为夫人’”，且曰：“史于二人（胡芳、左棻）皆称贵嫔，不称夫人，而于诸葛夫人、谢夫人独称之，岂《晋书》之疏失耶？”^⑥容庚先生引王隐《晋书》不符合原意。《御览》卷一四四引王隐《晋书》曰：“胡芳以选入宫……后拜芳夫人”，卷一五五同是引王隐《晋书》，又同是述其父“哭曰”云云，则曰“拜芳为贵嫔”。不是像容先生所说的胡芳先拜为“贵嫔”，“后拜为夫人”，好像“夫人”比“贵嫔”秩高一等。《御览》两处引王隐《晋书》文字稍有差异，正说明在《御览》编撰者看来，“贵嫔”即为“夫人”之列，古人引书往往“意引”，就浑言而不析了。古人称左棻或曰“左九嫔”，如南朝梁时尚有“《左九嫔集》四卷”，唐代却散佚为“《左九嫔集》一卷”^⑦，左九嫔，即指左棻，如果指其曾为“修仪”而言，当无不可，但若指其后为“贵嫔”而言则误，但晋代以后称左棻为“左九嫔”，却使人误认为左棻未成为“夫人”，仅仅属于“九嫔”之列。《墓志》的发现，称其为“贵人”，更证明了左棻已入了晋武帝“三夫人”之列是毫无疑问的。当然，《晋书》称她为“贵嫔”，《墓志》称她为“贵人”，虽皆为“三夫人”之列，但还是有点差异的。按时代讲，《墓志》为当时人所制，《晋书》为唐人修撰，似乎《墓志》应更准确；但《晋书》也利用了晋代的不少原始史料，且撰《墓志》的人也未必字字皆精确无误，如同是晋代的《荀岳暨妻刘简训墓志并阴》“所记干支，考之长术多误”，“于此见古人行文之不慎矣”^⑧，所以《左棻墓志》也难保一点错误没有。因此，在左棻内职记载的准确性上，我倒乐意投《晋书》所记左棻为“贵嫔”一票。即便如此，《墓志》所载左棻为“武帝贵人”也

并非毫无价值的，它对于进一步证明左棻已入“三夫人”之列还是有点用处的。

关于左思的父亲，《晋书·左思传》曰：“父雍，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世说新语·文学》“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章刘孝标注引《左思别传》曰：“父雍起于笔札，多所掌练，为殿中御史”，《元和姓纂》卷九：“邱明之后魏左雍为侍御史”，《北堂书钞》卷一〇二引王隐《晋书》曰：“（左思）父雍，起卑吏，晋武以为能，擢为殿中侍御史”，《太平御览》卷一四五引王隐《晋书》曰：“又采侍御史齐国左维女为修仪，有文才。”以上见诸于文字的记载，除《御览》引作“左维”，当系“左雍”而误外，皆作“左雍”，而《左棻墓志》却作“父熹字彦雍”，“左雍”或当为“左彦雍”之误书，相沿成习，众书皆误成了“左雍”，自当以《墓志》所载“名熹字彦雍”为是。关于左父的官职，以上众书皆记为“殿中侍御史”，此官行监察等职，唐代殿中侍御史官阶为从七品，可见是不高的。《左棻墓志》记其父为“大（太）原相弋阳大（太）守”，其职较高，这或当是左父后来的官职，也可能是左棻入宫以后，其父受到的提升。据《晋书·武帝纪》“太康十年（公元289年）”载“改诸王国相为内史”，则左父由殿中侍御史迁任“太原相弋阳太守”当在公元289年（时左棻入宫已十七、八年）之前。《墓志》载其“嫂”未载其“母”，可证《左思别传》所言之“思（左思）蚤（早）丧母”之可信（《晋书》等均未载此）。《墓志》不载其母而载其父，可能左棻逝世时其父还健在，按正常年龄推算，其时或已接近七十岁的高龄了吧。《晋书》记左思字“太冲”，而《墓志》作“泰冲”，“太”、“泰”古字相通，书写时或有异耳。《墓志》载左棻之“嫂”即左思之妻曰“翟氏”，当是左棻去世时翟氏尚健在，此后大约四、五年（专家们推测左思约生于250年，约卒于305年^⑨），左思就去世了，按无

特殊情况推算，翟氏当死在左思之后。如果有人创作关于左思的传记小说，写上左思之妻为“翟氏”，可谓于史有据了。

左思有两个儿子，这是现存所有古籍中都不见记载的，唯独《墓志》保留下了这重要的记述，这对于研究左思的家庭是极珍贵的资料。从《墓志》记载来看，左思共有四个孩子，最大的和最最小的是男孩，中间两个是女孩。推算起来，左蔡死时左思长子大约有三十出头的年龄，幼子大约二十出头吧。看来两个儿子在功业、著述方面都无什么成就，所以默默无闻，古籍中不见有记述。《墓志》中还记载了左思的两个女儿，这是很难得的，特别是在重男轻女的封建时代把两个并不显赫的后辈女子刻写到墓志上，真可以说是个奇迹！左思有一首独具特色、流传千古的《娇女诗》，写的就是这两个女儿的事。其诗曰：“吾家有娇女……小字为纨素”，“其姊字惠芳，面目灿如画”。二女之字和《墓志》所载全同。从《墓志》上我们更可知晓这一对小姊妹幼者名媛（字纨素），长者名芳（字惠芳），真是来源于生活的写实之作。对照《墓志》再来读《娇女诗》，感到格外亲切有味，似见二女从古代走来，活跃于字里行间。左思在《三都赋序》中主张写赋要真实：“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由《墓志》看《娇女诗》，可见左思是遵循着现实主义道路前进的，由此可以想见左思的《白发赋》、《招隐诗》、

《悼离赠妹诗》、《咏史诗》、《杂诗》等作品中写到的与己有关的事物，皆有实迹可寻，决非无中生有、向壁虚构的“空无”之物。由此也可以看出左思创作的最基本的特色。《娇女诗》

“小字为纨素”之“纨素”，《诗纪》作“织素”，“其姊字惠芳”之“其姊”，《诗纪》作“其娣”，“惠芳”之“惠”，《御览》作“蕙”，由《墓志》所载，可证《诗纪》、《御览》引录之误。由《娇女诗》所写情形来看，幼女不过十岁，长女不过十二、三岁，估计此诗写在公元283年左右，左思三十岁出头

时吧。左棻死时，两个女孩似都超不过三十岁。

由《墓志》和史传记载对照，可见许多不同之处，这正说明这块墓志不是古董商人作伪，因为他们如果要作伪就怕露出破绽，就不敢不据正史，专家们再从其他方面加以验证未发现什么可疑之处，都相信它确实是左棻的墓志，是一千几百年前的晋代遗物，否则我们对它价值的探讨就失去了意义。这块《墓志》虽然简朴而小，但上面刻写的文字却书法古朴遒劲，甚见功力，可以说是墓志中的上品^⑩。左棻在后宫的地位可以说是在皇后一人之下，众妃嫔万人之上，而墓志却这样陋小，似可见当时葬礼之简率，或正处大动乱中，故草率了事，而墓志中的文字却为上乘之作，或当为左思书写乎？据《晋书·左思传》“思（左思）少学钟、胡书及鼓琴，并不成”，可知少年时的左思专门练过书法，虽“不成”为书法家，但还是有一定功底的。左棻的墓志在一般情况下是要请专人撰写的，但在那大动乱的非常时期，有可能由左思捉刀（将他二女之名刻写到墓志上与他在《娇女诗》中所表现的冲破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是一致的），虽无其他材料可作旁证，但作这样的推测或者也并非全无道理。

注：

①李长之文章载《国文月刊》第70期，1948年8月。

②《左棻墓志》拓片，见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第一册卷一，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③容庚《古石刻零拾》：“所见志石晋故虎牙将军王君表外，未有若斯之小者。”转引自《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左棻墓志并阴》。

④容庚《古石刻零拾》，转引自《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左棻墓志并阴》。

⑤罗振玉《辽居乙稿》，转引自《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左棻墓志并阴》。

⑥容庚《古石刻零拾》，转引自《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左棻墓志并阴》。

⑦《隋书·经籍志四》“晋江州刺史王凝之妻《谢道韞集》二卷”后原注曰：“梁有妇人……晋武帝《左九嫔集》四卷……亡”。《旧唐书·经籍志下》和《新唐书·艺文志四》皆曰：“《左九嫔集》一卷”。

⑧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卷一《荀岳妻刘简训墓志并阴》释文。

⑨如陆侃如，见《中国诗史》中册第339页；如曹道衡，见《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题解》第96页。

⑩罗振玉《辽居乙稿》论述《左棻墓志》时说：“频年晋志出土者不下七八品，文字之精，要以此与《荀岳》推首矣。”

作者工作单位：山东大学古籍所。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